

古今點校疑案錄

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编

三



中華書局

古籍点校疑误汇录

(三)

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编

中 华 书 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古籍点校疑误汇录.3/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
小组编.—北京:中华书局,1989(2002 重印)
ISBN 7-101-00661-2

I. 古… II. 国… III. 古籍整理—中国—文集
IV. G256.1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81350 号

责任编辑:沈锡麟

古籍点校疑误汇录

(三)

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编

*

中华书局出版发行
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

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印刷

*

850×1168 毫米 1/32·14 印张·250 千字

1989 年 1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

印数 3001-5000 册 定价:23 元

ISBN 7-101-00661-2/Z·69

序

近年来,有关古籍的整理,从标点上、校勘上、注释上说,都是很有成绩的。但部分的书,或书的某一部分,标点不当,校勘不确,注释不精的情况还是有的。譬如中华本《二十四史》,是以一个极整齐的专家组织来完成的,亦不是无懈可击,细细阅读,仍然会找出一些标点不当的地方。

标点,总的要求是适当的分段,恰当的应用逗号、句号、顿号、分号和冒号这些符号来断句。可惜古人著作,逻辑性不强,有时段落不清,因此分段时某些句应属上,应属下,也颇费斟酌。断句则有各自对文义的理解的程度,某字属上,某字属下,甚至有些文句,至今仍属争议,未能一致通过。除此之外,其所以不当,也有一时的疏忽之处。

校勘就有底本、校本、参校本的问题,异字、异文的裁断的问题,衍文、错简的认定的问题,以及其他问题。特别需要有汉文字学的知识,其不当之处,就不能推之于一时疏忽了。

至于注释,更首先要求是有关这一古籍的专门知识,

其次是相应的辅助知识。不懂先秦文字的使用，不懂墨家哲学，不懂一点科学，要注释《墨经》就比较困难了。这不是一般的目录学，一般的校勘学所能应付得了的，勉强搞出来的东西，自将疵漏百出了。

同时，还有编辑一道关。作家颇不满意于编辑先生的经常退稿，并附一复信，指出这里不行，那里不行。其实，当编辑的工作是很苦的，不管你愿不愿意，寄来的或约定的稿子，都得通读一遍。编辑只是一种职务，它并不表示比来稿的作者的知识水平就怎么高好多。即或通读了，有些点、校、注的错误，也会在编辑的眼皮下溜过。编辑不能负一切责任，但有些书的点校情况不佳，而又居然出版了，则显然是编辑把关不严之过。

因此我们经常文、史、哲的期刊上，在各大专院校的学报上，看到有些文章，对于某些古籍，或某些古籍的某些部分，针对校点不当，校勘不确，注释不精的地方，详细提出意见。有关这些意见的文章，发表时间有早有迟，学术范围有文，有史，有哲，议论水平有的成系统，有的属随笔。且散在各期刊上，如需参考，实难随手查核。现在，我们尽可能就所见所闻，广事搜集，把它们录为一编，付之排印，以便翻检。

这些作者是不是有意向鸡蛋里挑骨头呢？这里可能有两种情况：一是原书不误，鸡蛋里并无骨头可挑。二是原书确有误，居然在鸡蛋里挑出骨头来了。我们不想自居于法官地位，滥行裁决，我们亦不是任何一方的辩护律

师，辩称你错他对。我们现在虽然把这些有意见的文章搜印在一起了，我们却采取个“和稀泥”的办法，把这本书命名为《古籍点校疑误汇录》。这可能会成为一本对校勘学有辅助意义的书。图书馆或可供陈列参考；出版社或可根据已提出的意见，在印第二版时有所改正；文史哲各部门的研究者或可从中吸取一点经验教训。假如我们在这方面的古籍整理水平逐年都有所提高，使那些挑骨头的同志们，无所着笔，这类汇录就不必再印第二本了，实为万幸。

其实这些问题并不大，治学态度稍事严肃，就会大大改观。乾嘉学风主要在创造发明方面，其末流乃流为烦琐，为世诟病。今天的问题，在于继承乾嘉学风当中，不是发扬主要的方面，而是模仿末流且又过之。

兹姑以王引之的《经传释词》为例。

王著《经传释词》十卷，共列词二百五十四字。本书全文概计为十万字，平均每词举例不超过四百字。四书五经、诸子百家、春秋史传，以及有关注家，都引用到了，文字却非常简洁。引注家时，有“王肃注”、“皇侃疏”、“颜师古注”等，而对郑玄的注，则只“郑注”两字，杜预的注，则只“杜注”两字。词字注音只有：“吹音聿”、“台音怡”、“号音豪”、“乡音向”、“汔音迄”、“邪以遮反”、“于音乌”、“愁鱼觐反”、“其音记”、“其音姬”、“詎·巨遽二音”、“徂读为且”、“且子余反”、“曾音增”、“曾音层”、“瞽音惨”、“啖音兹”、“毗音紫”、“畜施智反”、“属音烛”。十六处音

读，四处反切，仅为全书列词的百分之八。而这类音读的标示，皆和释词有关，不是为音读而音读。全编整个结构极为朴素，到能说明问题解决问题为止，绝无枝蔓之嫌。举某一词作某解，引用一古籍文句之后，例将某解替换某词，以明文义。而后又复举古籍若干例，则不再分别以某解替换某词，仅结言“义同”、“义并同”、“其义一也”、“义亦相近”、“互文耳”、“皆仿此”，等。或则于引用古籍文句之后，接以“是也”二字，或直言以上皆某义，以证其说。又如引用典注与己意不合者，则多结言，“于义未安”、“故多不安”、“失之”、“解者皆失之”、“皆于文义未协”、“则失之矣”，或直言“非也”。这既合于“举一反三”之理，亦使读者自行思维，经过词义一一替换的过程，加深了解，自此，变王引之的释词为读者自己的释词。在这个基础上，读者将会在运用方面，有所发扬，扩大这一认识范围。近人张相为《诗词曲语词汇释》，依例举词，以释词曲，文从义顺，灿然成编，《经传释词》之作实为其先导。

对于《经传释词》，章太炎虽然写了一篇《王伯申新定助词辩》，以正王误，以申己说，但所列词不过十一例耳，尚不足王著列词的百分之五。但章在其《检论》上说：“（王）念孙疏《广雅》，以经传诸子转相证明，诸古书文义诂训者皆理解。授子引之，为《经传释词》，明三古词气，汉儒所不能理绎。其小学训诂，自魏以来，未尝有也”，给了王氏父子以极高的评价。所以这样能形成所谓“乾嘉

学风”，学者绝不依傍汉儒，而在熟读深思，独创新解。乾嘉学派的大师都是些有创见的人，其著作作风也是很朴素简洁的。这一派的后起者，乃以堆垛为事，烦琐为上，钞袭为能，流弊所及，自成为魏源、龚自珍直接攻击的对象。仍以《经传释词》为例。近人如拿到这个题目，即或还是二百几十词，但在写作上则非加上十倍，写够一百万字不可，似乎不如此不见功力。我偶翻《魏源集》（中华书局标点本），见其《武进庄少宗伯遗书序》，他引了班固《艺文志》一段话，现节要于下：“……后世经传既已乖离，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，而务碎义逃难，便辞巧说，破坏形体。说五字之文，至于二三万言，后进弥以驰逐。……”看来烦碎之祸，早在东汉就有了，以此亦不能完全怪在乾嘉学派身上。解释五个字就要二三万言，是每字的释文当为四千字到六千字。做部《经传释词》，以每词四千字为准，天公地道，自然就该一百万字了。

这些注家大概都把读者看成劣等中学生，不会查字典，普通到一二三四，都要引《说文解字》，以证明其一是一，二是二。这不过起了抄录的作用，即抄录亦无真知灼见的抉择；对于前人立意，未必了了，即有，亦依违其间，无所可否。对于此一学术领域，真正有何创见，有何发明，就更难说了。至于行文之啰嗦，动辄数十万言，既嫌词费，亦类炫博，其例甚夥，皆无当于学术著作之实际意义。

遵循唯物辩证法的逻辑，议论则独具匠心，务去陈言，述作则力求精炼，誓戒烦琐，十年二十年后，其影响所及，或能对中国古籍之整理与研究，养成一种实事求是的良好学风。凡此所言，尤愿青年学者留意及之。

《汇录》辑成，因为之序。

一九八四年大暑 李一氓

出版说明

1981年7月,中共中央发出了《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》,随后国务院决定恢复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,任命李一氓同志为组长。经过半年的筹备,规划小组于1982年3月召开全国古籍整理工作会议,制定了《古籍整理九年(1981—1990)规划》,从此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呈现生机勃勃的气象,仅1982—1983年两年,即出版新书510多种,重版书350多种,两者合计860多种,闹了多年的“书荒”问题随之缓解。面对古籍整理成绩喜人的局面,李一氓同志及时提出质量问题,指出有些书标点不当、校勘不确、注释不精,并于1983年年底要求规划小组办公室尽可能就所见所闻,广事搜集,把在文史哲期刊上发表的批评性文章录为一编,付之排印。根据李老的指示,规划小组办公室自1983年至1990年,逐年将各种文史哲期刊和大专院校学报上发表的有关古籍整理(包括标点、校勘、注释、今译)的批评性文章,汇编成《古籍点校疑误汇录》(以下简称《汇录》),第一、二册作为内部资料印发,三、四、五册改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,六、七、八册未曾付

印,但基本上业已编就。

《汇录》第一册于 1984 年出版时有一《说明》,主要内容是:收入《汇录》的文章,大致按综合,文学(诗文、小说、戏曲、文学评论),历史和工具书顺序编排;至于文章内容,除个别注释予以删节,个别错字径予改正外,概仍其旧,其批评正确与否,编者不作判断;文章中批评的一些点校本、注释本、今译本,容或存在所指出的问题,但批评者往往就个人的见解提出意见,并非系统的评论,因此并不表明被批评的书质量必定很差。今天看来,其态度和做法,还是相当公允和稳妥的。

对《汇录》的编印,李一氓同志十分重视,亲自为该书拟定书名,撰写序言,题写书签,并予以充分肯定:“这可能会成为一本对校勘学有辅助意义的书。图书馆或可供陈列参考;出版社或可根据已提出的意见,在印第二版时有所参酌改正;文史哲各部门的研究者或可从中吸取一些经验教训”,使古籍整理水平逐年有所提高。由于《汇录》不仅为查找资料提供方便,而且对研读古籍有一定的辅助作用,许多古籍整理工作者视之为良师益友,一些大专院校还将它列为文科研究生的必读参考书。不久前,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出于对古籍整理人才培养的需要,要求我们重印出版,我们愉快地接受了任务。由于时间较紧,近日只推出前六册,后两册尚有一些编辑工作要做,估计年底才能出版。

这套书的重印出版,得到了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

领导小组的资助,在此谨致深切的谢意。

中华书局编辑部

2002年10月

目 录

古籍整理中的点、校、注、译问题	吴小如 (1)
古籍整理与训诂学	王海根 (13)
古诗古文校注得失例谈	吴孟复 (18)
古籍整理中姓氏与地标点失误举例	王 迈 (36)
关于古籍整理和引用中存在的若干问题	林 薇 (48)
古书句读札记	王云路 (56)
对《楚辞补注》点校本的一些意见	俞明芳 (65)
《全唐诗续补遗》校读续	房日晰 (77)
《全唐诗外编》重收《全唐诗》杜牧诗之例	郭文镐 (93)
《唐人绝句选》地名注商榷	徐 俊 (95)
《王梵志诗校辑》校释补正	袁 宾 (100)
王梵志诗校注辨正	刘瑞明 (115)
《王梵志诗校辑》商榷	蒋绍愚 (121)
《岑参集校注》的几个问题	王刘纯 (153)
谈《杜甫选集》的地名误释 ——与邓魁英、聂石樵同志商榷	王德全 (163)
《宋诗精华录》校点小议	陈增杰 (167)
新版《陈与义集》的校点问题	白敦仁 (171)
《板桥诗词撷英》读后	程芳银 (177)
误收唐人诗	郭剑冬 (183)
蓬莱阁诗文误注多	牟 城 (184)

《历代名人咏晋诗选》注释之质疑	马斗全 (189)
《世说新语笺疏》标点琐记	黄灵庚 (196)
《世说新语笺疏》标点商榷	方北辰 (201)
敦煌变文校勘复议	刘凯鸣 (218)
《红楼梦》标点一得	周林生 苏 海 (228)
关于《元杂剧选注》注释的几点浅见	洛 康 (230)
《元杂剧选注》中一些注释的问题	刘凯鸣 (232)
再评王季思先生的《西厢记》注释	王学奇 (245)
《四声猿》中一条注	傅保民 (254)
《宋诗话辑佚·诗史》校读记	钟振振 (256)
中华书局标点本《史记》句读校勘商榷	凌 培 (264)
《史记》“历诸侯”注释商榷	张中良 (268)
《汉书》标点中的一些问题	张如元 (270)
《汉书》勘误两则	岳庆平 (284)
《三国志》勘误一则	黄茂生 (286)
点校本《宋书》、《南史》献疑	丁福林 (287)
《南史》校勘二则	陈庆元 (296)
《隋书》、两《唐书》“百(职)官志”校读拾零	张国刚 (298)
两《唐书》标点商榷	李 恭 (313)
《旧唐书》“咸阳望贤驿”应是“咸阳望贤宫”	杨希义 (329)
校点本《旧五代史》献疑(九则)	张其凡 (331)
《宋史·本纪》校记举例	顾吉辰 (340)
补校《宋史·司马光传》一则	杨 毅 (352)
是靖宣不是宣靖	刘肃勇 (354)
《明史·功臣世表》漏校举隅	杨 昶 (355)
《明史》校勘五则	官大梁 (358)

《明史纪事本末》人名勘误一则	王兴亚 (360)
唐宋笔记校点辨误	王 瑛 (362)
《闻见录》标点献疑	小 兹 (367)
重印本邓注《东京梦华录》献疑	王 瑛 (371)
新校《齐东野语》误标数例	王 瑛 (374)
《不下带编》《巾箱说》校点举疑	吴宣德 (376)
《水经注校》标点疑误	赵新德 (385)
《元和郡县图志》正误一则	刘锦文 (399)
《戴震集》标点质疑	钟敬华 李恕豪 (401)
《魏源集》“补录”校点质疑	管 林 (405)
《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》校例	李大东 (408)
《小说词语汇释》质疑	隋文昭 (412)
《常用文言实词讲解》正误	赵新德 (421)

古籍整理中的点、校、注、译问题

吴 小 如

古籍整理工作在党的关怀下已提到日程上来，这是大好事。但这项工作却并非易事。我曾在一次有关古籍整理的笔谈中提出以下的意见：一、在增加人手的同时要把好质量关，不能让新校点的古籍里面错误层出不穷；二、有些学术单位的领导同志，甚至连从事古籍整理工作的当事人本身，都应该重视这项工作。现在普遍认为整理古籍不如撰写论文吃香；领导在考虑一个人是否应当晋级加薪时，往往着眼于他发表了几篇文章而不是看他校点了多少古书。即使在新颁布的稿酬条例中，从事古籍整理工作者的报酬也不及撰写文章所得的稿费数目高。这就不能不使人担心了。我写这篇小文的目的是向社会呼吁，说明整理古籍是既繁且难的工作，决不比写文章容易，对此实在不能掉以轻心，认为一蹴便可几于成功。

一、关于古书的标点

现在读者意见最多、反映最强的是新出的古书标点

错误太多，校对也欠精审。有的刊物收到指摘古书在标点方面有错误的来稿所占比重也较大。就我个人接触到的书籍而论，有的书印数多、销售量大（如毛批本《三国演义》），而其中标点错误竟俯拾即是，信手可拈。古典小说尚且如此，它书可想而知。近日借到 1980 年出版的蒋良骥《东华录》一册，仅卷四里面从第 63 至 69 页，就发现六、七处问题。如第 63 页云：

誓谕诸将，勿杀无辜，勿掠财物，勿焚庐舍，不如约者罪之。仍晓谕官民，以取残除暴共享太平之意。

这里的“官民”和“以取残除暴”之间不应点断，其意实为“仍以取残除暴共享太平之意晓谕官民”，不过用了个倒装句法而已。现在用逗号把一句分割为二，句义便不相联属。又如第 64 至 65 页：

修(正)〔政〕历法汤若望进所制浑天星球一床，地平日晷窥远镜各一具，并舆地屏图，并请所有应用诸历永依西洋新法推算。从之。

这里正文究应用“政”还是用“正”，尚待商榷；而主要的是“修正历法”之后应加句号。然后再说明汤若望进献了什么，请求做什么。否则文义便不可通。另外，“地平日晷”和“窥远镜”明明是两件东西，下文又有“各一具”字样，则“晷”后应加顿号。现在囫圇而下，显然不妥。最奇怪的是自第 67 至 69 页引史可法《答多尔衮书》，以引号括其全文，却独独把“弘光甲申九月十五日”一句置于引号之外。难道这一句年月日不是史可法原信所有，倒是《东华